

《针经》《素问》编撰与流传解谜

黄龙祥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北京 100700

通信作者: 黄龙祥, Email: hymhlx@163.com, 电话: 010-64089287

【摘要】 通过对传世本《灵枢》《素问》编纂思想的发掘和梳理,发现二者是一部完整书的两个部分,二者的性质、关系是以《灵枢》为内篇,系理论创新之作,叙述方法以“撰”为主;以《素问》为外篇,为临床应用和资料整理性质,叙述方法以“编”为主。内、外篇皆成于西汉晚期至东汉之间,作者为曾长期在国家藏书机构任职的一流学者。在宋以前外篇流传更广,内篇则流传很有限,二者在传承过程中,虽内容有亡佚及添补、篇次有错乱及人为调整,但总体而言,失真的程度不大,特别是内篇《灵枢》。

【关键词】 《针经》; 《素问》; 《黄帝内经》; 版本流传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ZDA195)

DOI:10.3760/cma.j.cn112155-20200316-00026

Puzzle Solution of the compil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Classics on Acupuncture and Plain Questions

HUANG Longxiang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Huang Longxiang, Email: hymhlx@163.com, Tel: 010-64089287

【Abstract】 Through mining and collecting the compiling thought of *Miraculous Pivot* (《灵枢》) and *Plain Questions* (《素问》), which were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se two ancient works refer to two components of one integrity book. With regard to the character and relationship, *Miraculous Pivot* is the main section and the essence, focusing on theoretic innovation. “Writing” is predominated in its statement. *Plain Questions* is the supplementary opinions to the main section, containing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material collection. “Compiling” is predominated in its statement. Both of two works were completed betwee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author was a leading scholar and had worked in a national library for a long time. Before the Song Dynasty, *Plain Questions* had been widely circulated, while the spreading of *Miraculous Pivot* was limited.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some of the content of these two works were lost or supplemented, and the chapters were disarranged or adjusted artificially. But, in general, the original is not distorted seriously, especially the essential section, *Miraculous Pivot*.

【Key words】 *Classic on Acupuncture*; *Plain Questions*; *Yellow Emperor's Internal Classic*; Circulation of Editions

Fund Program: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19ZDA195)

DOI:10.3760/cma.j.cn112155-20200316-00026

传世本《灵枢》《素问》成于何时? 出自何人之手? 是古籍整理的产物还是理论创新的结晶? 是两部不同的书,还是同一部书的两个不同部分? 笔者的最新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传世本《灵枢》《素问》是一部完整书的两个部分:前者为内篇,为理论创新之作;后者为外篇,为临床应用和资料整理性质。原书未题总书名,其外篇名曰《素问》,而内篇原未题书名,在魏晋时即

以“九卷”为暂用名(后又有“九灵”“九墟”“针经”“灵枢”等别称)。《针灸甲乙经·序》以“黄帝内经”为《九卷》《素问》的总书名,实与《汉书·艺文志》著录刘向整理的《黄帝内经》非同一书。

第二,该书内、外篇皆成于西汉晚期至东汉之间,作者为曾长期在国家藏书机构任职的一流学者,其主要的撰写活动当在其卸任或被罢免之后的若干年内完成。

第三,《灵枢》《素问》在传承过程中,其内容虽有亡佚及添补、篇次有错乱及人为调整,但总体而言,失真的程度不大,特别是《灵枢》部分。

第四,此书内篇《灵枢》价值主要不在于保存汉以前各家医籍,而是体现在整合汉以前各医家学说,创立统一的中医针灸学的理论体系。

1 构成

细察传世本《灵枢》《素问》篇目设置,发现有如下规律。

①身体观的系统论述,以及针灸学体系的分部理论(气街学说、经络学说、经筋学说、营卫学说、三焦学说等)皆在《灵枢》;而有关针道的解释、修炼、应用,以及非主流的诸说别论多在《素问》。

3 篇针道别论“阴阳别论”“五脏别论”“经别论”皆在《素问》,其他别论也都置于《素问》;6 篇经文注解除《小针解》1 篇外,其余 5 篇皆在《素问》;另辑录的扁鹊医籍 7 篇也附在《素问》。

②主流的学说、诊法、输穴、刺法、治法在《灵枢》,而非主流的、乃至废用的学说、诊法、刺法、治法在《素问》。

例如论正经、经刺以及论经输之本输、标输、背输等皆在《灵枢》,而奇经、缪刺、背输之别法者在《素问》;汉代主流或新立之脉诊如寸口脉法、人迎寸口脉法集中在《灵枢》,而诊脉古法如三部九候在《素问》;针刺古法如扁鹊早期针方之砭刺、刺脉,以及灸法的临床应用等在《素问》。

③刺法标准、治疗大法集中在《灵枢》;具体的临床应用多在《素问》。

标准及治疗大法在《灵枢》,正体现了作者“必明为之法”“为之经纪”的编撰宗旨。

通过以上 3 方面对比,作者对于《灵枢》《素问》二书的不同定位反映得非常明确——以《灵枢》为主,以《素问》为辅。若以汉代书分“内”“外”的体例,则以《灵枢》为内篇,以《素问》为外篇。内篇更多体现的是理论创新、体系构建,而外篇则重在理论的临床应用,更多体现出实用性和资料性;前者“撰”的成分更多,而后者“编”的成分更多。

从篇名上看,《灵枢》《素问》的主从关系也一目了然:《灵枢》有“玉版”,《素问》则有发挥此篇的“玉版论要”“玉机真藏”;《灵枢》有“经脉”,《素问》则有“经脉别论”。

从引文体例看,传世本《灵枢》《素问》有 7 处引文前标明“经言”字样,其中 6 例见《素问》,所引之文皆见于传世本《灵枢》;见于《灵枢》者只《岁露

论》一例作:“黄帝问于岐伯曰:《经》言夏日伤暑,秋病疟。疟之发以时,其故何也?”^{[1]150} 此句不见于《针灸甲乙经》《太素》,且接下来的答语也与问句不相接,显有误。《素问》可见大量注解、阐释《灵枢》经文专篇,却无一篇解《素问》自身经文者。相反,《灵枢》却不见注解、阐释《素问》经文之篇,惟一篇乃注解自身经文。可见,作者在设计上以《灵枢》为“经”,《素问》为“传”的意图十分明显。传世本《灵枢》《素问》的关系,犹如汉代刘安的《淮南内》《淮南外》“内篇论道,外篇言事”,而道与事的关系也正如《淮南子》后序所言“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2]。如此,内外表里相合,有主有次,有详有略,既突出了理论创新之简明,又兼顾了临床应用的实用性和资料性。

这种内外篇不同性质和目的定位也决定了二者写法上的不同设计,具体情况如下。

内篇在设计上有绪论性质的开篇《九针十二原》和总括全书要旨的结语篇《官能》;全书各篇之间的逻辑关系紧密,因而在写法上,前后篇章中高频出现内容相互引用的“互引”之例。外篇《素问》在设计上,则体现对内篇所论针道的注解、应用,以及针道的非主流别论,突出实用性和资料性,因而篇与篇之间多不表现为环环相扣的内在联系,鲜见“互引”之例。

另须指出的是,《灵枢》原始本可能为 9 卷,但不一定 81 篇,传世本第 48 篇《禁服》提到“通于九针六十篇”,又结语篇《官能》在传世本为第 73 篇,推测原始本篇幅当在 70 篇左右。细读传世本《灵枢》前 9 篇发现很像是全书的一个大摘要,很有可能是后编成而不是先编成。因为,如果先编成《终始第九》,《禁服第四十八》就没有再编的必要,即使要编也会直接引《终始》而不会引《外揣第四十五》;同样,《经脉第十》有关人迎寸口诊法的内容也会直接引《终始》,而不会引自《禁服》。由此推断,《针经》的原始本是先编成 60 篇全本,再编成 9 篇的简本,加上结语篇则全书篇幅当在 70 篇左右。

2 书名

关于传世本《灵枢》《素问》的命名,总括分析前人的研究得到如下判断。

第一,外篇名曰《素问》;内篇原无定名,唐以前以“九卷”为暂用名,并先后有“九虚”(又作“九墟”)“九灵”“针经”“灵枢”等不同命名方案,传世本沿用《灵枢》之名。

第二,原无总书名,笔者确定内外篇完整的命名方案为:内篇曰“黄帝针经”,外篇曰“黄帝素问”。

关于内篇的题名,在传世本《灵枢》开篇《九针十二原》即题曰“针经”,《口问》篇又名曰“九针之经”。据笔者考察发现,在传世本《灵枢》《素问》中“九针”一词有广义和狭义 2 种用法:广义的“九针”是指针灸之道,而狭义的“九针”是指九种针具。作为书名“九针之经”中之“九针”是广义的用法,而书中大量出现的“九针”也往往用作“九针之经”的简称,即指“针经”。

然而或因原本未题书名,或原书名在传抄过程中脱失,汉末《伤寒论·序》称引内篇时径用“九卷”之名,但此序的构成及年代学术界有争议^[3],还不能据此确证此暂用名已见于汉代。年代确切的魏晋《脉经》一书明确以《九卷》称引内篇,但在传世本《脉经》中这类引文出处都被改成了《针经》,此乃宋代校正医书局所改。关于宋以前《脉经》古本的引文标注,唐代王冰“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新校正》说得很清楚,“又《素问》外九卷,汉·张仲景及西晋·王叔和《脉经》只为之九卷,皇甫士安名为《针经》,亦专名《九卷》”^{[4]5}。这里明言张仲景书及《脉经》称引内篇皆用“九卷”之名,所说“皇甫士安名为《针经》,亦专名《九卷》”,是指《针灸甲乙经·序》引作《针经》,而正文的引文标注作《九卷》,恰巧传世本《针灸甲乙经·序》也有疑问^[5],故不能据此认定西晋已用“针经”作为内篇的专用名。足见,早期流传的内篇未题书名,后世医书径以“九卷”这一暂用名称引,直到唐代杨上善奉敕官修《太素》时仍用“九卷”“素问”称引内、外篇。专用书名“九虚”(又作“九墟”)“针经”“九灵”“灵枢”等皆晋以后唐以前出现,其中《灵枢》一名沿用至今。

可见,传世本《灵枢》提及的内篇书名“针经”或未正式题作书名,或流传初期书名即脱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以“九卷”这一暂用名流传;而外篇从开始流传社会即名曰“素问”,并一直沿用至今。内篇、外篇虽一开始即作为一部书流传,但没有统括内篇外篇的总书名,后世有以“黄帝内经”作总书名以统内外篇曰“黄帝内经素问”(如本)、“黄帝内经灵枢”(如宋代史崧本),这里的“黄帝内经”实用作“黄帝医经”的代名词,这一点从以下的古医籍命名可以清楚看出:《黄帝内经太素》《黄帝内经明堂》。从这个角度看,“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的命名方案可以成立,然而这样的命名极易误导人们将传世本《灵枢》《素问》等同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内经》,因此不宜采用。

传世本《灵枢》《素问》在最早著录的官修目录《隋书·经籍志》,名曰《黄帝针经》《黄帝素问》,其中外篇的命名古今无分歧,而内篇虽有多种不同的命名。但综观中外书目著录可知“黄帝针经”一名是最流行的,从官方正式文件的正式命名亦可看出这一点,例如唐政府诏令永徽令、开元令,以及宋天圣令皆称作“黄帝针经”。

完全可以将《黄帝针经》《黄帝素问》书名中之“黄帝”解读为“黄帝医经”或“黄帝医派”,而用作总书名,且这样的用例早在汉代刘向父子校书时已经创用。

传世本《淮南子》在成书之初,作者淮南王刘安将其定名为《鸿烈》,但这只是其主编之书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故《汉书》题作“内书”“内篇”。西汉末刘歆则为其书确定了一个总书名《淮南》,而内篇原作者所题书名“鸿烈”,刘歆或出于政治因素考虑,不使用而选择了一个不加褒贬的中性字“内”字,在杂家类正式著录为“《淮南内》二十一篇。王安^①;《淮南外》三十三篇”^{[6]40}。这里的“淮南”可以有地名、学派名、人名、书名多种理解。由刘向父子官方认定的《淮南内》一书,及至政治影响消退,魏晋时人们又用原内篇书名,加上刘歆拟定的总书名题作《淮南鸿烈》^[7]。

依此例,《黄帝针经》《黄帝素问》中之“黄帝”也完全可以解读为书名,即以“黄帝”用作总书名,以“针经”为子目内篇名,以“素问”为子目外篇名。加上总书名不仅仅在于标明《针经》与《素问》表里相合为一书的关系,也在于与汉代及汉以后流传的其他以“针经”为名的医书相区别。

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笔者确定传世本《灵枢》《素问》的命名方案如下:内篇名曰《针经》,外篇名曰《素问》;内篇全称曰《黄帝针经》,外篇全称曰《黄帝素问》,是以“黄帝”为总书名,而不再以“黄帝内经”为总书名。故以下除特指传世本外,内篇采用正式名《针经》,而以《灵枢》《九墟》《九灵》为别称。

3 年代

关于《针经》《素问》的成书,学术界分歧很多很大,但有一点似成共识:非一时之文非一人之书。笔者新近的研究得出与此共识截然相反的判断:虽《针经》《素问》性质不同——《针经》为“撰”;《素

① 此处不能确定“王安”是指“淮南王刘安”的简称,还是“刘安”之误。

问》为“编”,然皆由同一人完成,或总成于汉代^①。

试举一例说明笔者的解题思路: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一书是以唐以前各家文献为素材编辑的,假设此书在传抄过程中封面和自序都脱失了,我们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和成书年代,按照以往考察《针经》《素问》成书的思路来考察这部“三无”古医籍的年代,会得出什么结论?如将此书定为文献汇编性质,则可得出如下种种不同的判断:成书于先秦;成书于汉代;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成书于隋代;成书于唐代。于是最后得出一个调和诸说的“定论”——“此非成于一时出于一人之书”^②。可是如果丢掉这个成见,将此书设为成于一时的独立的中医临床诊疗全书,则很容易得出正确答案——成书于唐代,并可进一步给出一个相对精确的成书年代区间。

通过这个假想的年代考察实验,我们即可明白:今天考察《针经》《素问》的成书是指其编辑年代,而绝不是书中所采用的原始文献的年代。依照这一思路,则可以确定传世本《灵枢》《素问》成书于汉代,尽管书中的素材多取之汉以前古医籍。

第一,从书的性质考察,《针经》《素问》,特别是前者,是一部理论创新之作,而不是古籍整理的成果,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内经》《黄帝外经》的性质完全不同。

第二,从《针经》带有绪论性质的第 1 篇《九针十二原》的结构看,虽其正文采用了秦代乃至先秦的文献,但主人公的开场白却带有鲜明的汉帝口吻^[8]。

又知《九针十二原》首节文字系借黄帝之口阐述其编撰此书的宗旨及编撰计划,必定出自此书的作者之手,而作者笔下的“黄帝”形象与秦始皇格格不入,却与《汉书》所载之汉帝言行如出一辙,反映的正是此书作者所处的年代,故虽正文出现了秦代或先秦特征文字,但丝毫不影响确定此篇创作于汉代;又知作为的结语篇《官能》与《九针十二原》首尾相合同出一人之手,则必也写于汉代。如果一本书的绪论和结语确定为写于汉代,那么基本可判定全书成书于汉代。

第三,从《灵枢·大惑论》东苑清冷之台看,如果只是“东苑”,很难确定它是何时何地的建筑,然而当“东苑”与“清冷之台”联系在一起时,便可精准定位了。东苑,乃西汉梁孝王于公元前 153 年至公元前 150 年间所建集亭台、离宫、湖水、奇山、花草、陵园等于一体供帝王游猎、出巡、娱乐等多功能的园囿,“清冷台”是其中的美景之一^[9]。

《灵枢·大惑论》讲述的故事以东苑为背景,极有可能系某个汉代帝王的真实病案——可称为世界上最早应用精神分析法的病案^[10]。此外,该篇所反映出的精细的尸体解剖知识最大可能来源于王莽时官方尸体解剖的成果^[11]。大约在东汉末以后,东苑便逐渐荒废了。因此《大惑论》应写于东汉之前。

第四,从全书的学术主线看,内外篇皆引用了大量扁鹊医籍的文字,但都用新定的理论框架化裁^[12],例如《五色》篇素材来自扁鹊医学,中间插入的脉法却是《针经》主推的最新诊法“人迎寸口脉法”,留下了后人编辑的铁证。又如,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及新近老官山出土的扁鹊医籍可知,汉代初中期流行的扁鹊医籍中的藏象学说,其五脏为“心肺肝胃肾”,汉中期的非医籍《淮南子》依旧如此,而在《针经》新的理论体系中,扁鹊论五脏之“胃”除了个别回改未尽的实例,都被替换为“脾”^[13]。再如五脏配五行有所谓“古文说”和“今文说”,《针经》《素问》呈现的几乎清一色的“今文说”,明显是作者依据其新定的理论框架改编的结果。

第五,从内外篇的文本不难看出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国土的统一、思想文化的大一统的成熟,且黄帝文化大一统领袖地位的确立;其二,扁鹊的医学象征意义开始下降,而黄帝的医学象征意义上升;其三,黄帝诸臣中岐伯地位的提升;其四,医学文献的极大丰富并经过系统的整理。以上 4 条皆备者见于汉代。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医经类书目归于黄帝名下的医经的篇卷数明显超过扁鹊,以及神仙类书目著录的“《黄帝岐伯按摩》十卷”,可以断定:最晚在刘向校书时扁鹊的医学象征意义已开始下降,而黄帝的医学象征意义上升,且黄帝诸臣中岐伯的地位提升,并明确与医学发生关联。

第六,从国家藏书机构看,“兰台”是汉代设立的国家藏书机构属于内府藏书处,而《针经》《素问》反复出现藏秘典要籍于“灵兰之室”的经文,具体内容如下。

《灵枢·外揣》:“黄帝曰:……是谓阴阳之极,

① “成于汉代”是指原作者撰定的原始本年代,至于原始本流传社会后人的增补或改编并不影响对原始本年代的认定。例如后人(特别是宋人)对《伤寒论》《脉经》《备急千金要方》经典的添补和改编的程度更甚于后人对《针经》《素问》的改编,但学术界从未有人提出这些经典成于宋代的说法。

② 如按这一逻辑类推,则许多传世中医古籍都可说非一时一人之作,最典型的如《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诸病源候论》《太平圣惠方》等。

天地之盖,请藏之灵兰之室,弗敢使泄也。”^{[1]88}

《灵枢·刺节真邪》:“黄帝曰:善。请藏之灵兰之室,不敢妄出也。”^{[1]138}

《太素·五节刺》杨上善注:灵兰之室,黄帝藏书之府,今之兰台故名者也。^[14]

《素问·灵兰秘典论》:“黄帝曰:善哉,余闻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斋戒择吉日,不敢受也。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4]60}

《素问·气穴论》:“帝乃辟左右而起,再拜曰:今日发蒙解惑,藏之金匱,不敢复出。乃藏之金兰之室,署曰气穴所在。”^{[4]302}

《灵枢·岁露论》:“黄帝曰:善乎哉论!明乎哉道!请藏之金匱,命曰三实,然此一夫之论也。”^{[1]152}

从《素问》经文本身可知“金兰之室”即“金匱”,而据杨上善注“灵兰之室”即黄帝藏书之府,后世的“兰台”也由此得名。汉代设立的国家藏书机构,属于内府藏书处,所藏多属国家法规和皇帝诏令等,同时又是重要的校书著述之处。兰台的全盛期在东汉明、章、和帝三朝,自和帝之后,随着东观兴起,大量文人被征入东观修史,兰台的国家藏书、著述与校书的职能逐渐为东观所取代^[15]。而“金匱”在秦代即为国家藏书处,汉代沿用属于外府藏书处,所藏多属玉版和图讖^[16]。无怪乎这些大量见于《针经》《素问》的“灵兰之室”“金兰之室”都以“帝曰”“黄帝曰”的口吻提及。

综合以上 6 点可知:《针经》《素问》成书于汉代,约在构建文化思想大一统的《淮南子》逐渐被解禁的西汉晚期至《伤寒论》成书的东汉晚期之间。如果从第 6 条看,成书年代的下限可上提到东汉中期。因为东汉初校书藏书仍在兰台,而和帝以后直到东汉末则在东观,如果成书于东汉中期以下,则《针经》频繁提及的国家官府藏书处多半会写作“东观之室”“东观”之类。

有人认为《素问》文本表现出更古朴的特点,得出《素问》早出《针经》后成的判断,而据笔者考察《素问》有 2 篇注解《针经》结语篇的文字,显然不可能成于《针经》之前。人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主要是不明作者对内外篇的不同定位而采用的不同编撰方式:相对于《针经》的理论创新,《素问》带来更多的古籍整理的性质,因而更多保存了所辑录的早期文献的旧貌。

4 作者

关于作者,笔者新近的研究发现《针经》《素问》

皆由一人总成,作者的姓名未详,但可判定此人具备以下条件:①有在国家藏书机构长期任职的经历,能坐拥刘向、李柱国整理的全部或大部医籍;②广博的天地人知识以及非凡的文字表达能力。

由于编撰《针经》《素问》采用了大量汉以前医经类古籍,民间不可能具备,即使是像西汉最富盛名的淮南国、梁国的地方学宫也难以具备。虽然到了东汉,刘向父子校定的书籍渐渐流布社会,使得民间有机会见到以往收藏在国家藏书机构的古籍定本,然而在古籍以手抄方式传播的年代,没有特殊背景的学者读到刘向父子整理的全部或大部古医籍显然不可能。对此,《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总序说得很清楚:“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6]78};又《黄帝针灸甲乙经·序》曰:“方技者,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非能通三才之奥,安能及国之政哉”^[17]。在那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像《针经》《素问》这样集各家之大成而又自成体系的医经,最大可能出自兰台令官或有长期在兰台任职经历的医官或著名学者。

也有这样的可能,刘向父子、李柱国校医书已经有一个两步走的宏大计划:第一步整理传世各家医经,第二步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合百家于一统。如果这个可能性存在,那么这一计划中的第二步计划更大的可能是由李柱国或其传人完成。

进一步考察还表明,《针经》《素问》出自私修而非官修。具备以上条件的作者不似在任职期间编撰,而是辞职或因政治牵连被罢免之后创作。因为如果是刘歆本人或其任职之前或任职期间同僚的著作,刘歆不可能不知,且除非极端的政治因素,也不可能不著录。

作者不一定是有高超医术的医官,但须有极高的理论构建能力,从《针经》的设计及撰写不难看出作者的理论洞察力不仅胜过张仲景,也完胜更晚的《针灸甲乙经》作者。从《针经》《素问》所反映出的作者学识来看,此人应是当时的通儒大家,在其任职期间很可能在缮写医书定本时给自己留出一套副本,老年据此副本创作出惊世之作。也就是说,本书的编撰方式及作者的经历有如司马迁修《史记》一般——个人编撰而非集体编写,作者有长期在官府任职经历,但编撰工作却是在免职之后完成。而且像《针经》这种“成一家之言”,特别是以公理化方法构建统一理论体系的著作只能出自个人。

5 传承

关于《针经》《素问》的传承,笔者的新近研究得

到以下结论。

第一,与《淮南子》的命运正相反,外篇流传更广,内篇则流传很有限。

与其他内外分篇子书的传承规律不同,外篇《素问》被关注的程度更高,历经改编、续补和注解,而内篇《针经》则鲜见改编和注解。在传承上出现这种特殊的现象,考虑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其一,《针经》出于精心设计编撰,有整体贯一的内在逻辑,如果不能通悟作者的编撰思想,后人欲改编几乎无从下手,再创作的空间很小;而外篇《素问》的应用示例和资料性质使之在条理性和系统性上远不及内篇《针经》,因而有很大的再整理空间。其二,据笔者对《针经》《素问》完整性的考察表明,六朝时经全元起整理后的《素问》仍可见大量的文字重出与错乱,甚至同一篇文字以不同的篇名重出,则之前传本的错乱、重出现象当更严重,而“去其重复”是编书的基本要求,这提示很可能作者由于某种突发事件的干扰没能完成全书的编撰(主要是外篇《素问》部分),也就是说该书是一个未定稿,内篇未题书名,且无总书名,可能皆与此相关。

第二,传世本有亡佚、错简、续编。

亡佚的证据:关于传世本《素问》篇目及文本的亡佚,人们考论颇多,不赘述。其实,传世本《灵枢》也有所失,最明显的是《刺节真邪》所引之《刺节》原文早已不存。

关于错简,唐代王冰注解时已明确指出,具体情况如下。

《素问·通评虚实论》:“帝曰:形度、骨度、脉度、节度,何以知其度也?王冰注曰:形度,具《三备经》。节度、脉度、骨度,并具在《灵枢经》中。此问亦合在彼经篇首,错简也。一经以此问为《逆从论》首,非也。”^{[4]177}

《素问·奇病论》:“治在《阴阳十二官相使》中。”王冰注曰:“言治法具于彼篇,今经已亡。”^{[4]262}

详全元起注本《素问》有《十二藏相使》篇,论有“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推测《阴阳十二官相使》应是这一类的篇章。

此外,从《素问》注文与《灵枢》经文不完全对应的现象也能看出原文存在脱简和错简现象。

关于错简,同一书或同一篇文字的前后错乱现象,古今注家已发现并指出许多实例。而笔者发现《针经》结语篇《官能》所总结诸篇之要文字有 1 条不见于传世本《灵枢》,见于《素问·调经论》,而恰好是该篇明确提出了构建《针经》理论体系的元命题重要理论命题,按作者内外篇的设计原则,此篇置

于内篇是成立的,也有可能《官能》不见于传世本《灵枢》的条文出自亡佚的篇章中。

此外,传世本《灵枢》第 19~26 篇显得有些特别:其一,无黄帝君臣问答(第 19 篇的引言除外);其二,非论道而言病症诊疗,按理不应在内篇而应置于外篇。这有二种可能:其一,流传过程中篇次错乱,外篇的篇目被混入内篇,由于早期传本中,内外篇作为一个整体流传,且内篇缺书名,因此内外篇的文字很容易错乱,只是目前还未找到更多的证据证明《针经》《素问》二书相互错入的确切实例;其二,内篇在流传过程中篇目缺失不足九卷,而众人皆知其早期传本名曰“九卷”,又经文明言“余闻九针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故以外篇之文补内篇之缺——《素问》很早就脱失了一卷或与此有关。

另据传世本《素问》王冰所引《灵枢经》《针经》之文,以及林亿新校正的注文,亦可知传世本《灵枢》的脱、误、错简之例,具体情况如下。

《素问·三部九候论》:“中部人,手少阴也。”王冰注曰:“谓心脉也。在掌后锐骨之端,神门之分,动应于手也。《灵枢经·持针纵舍论》问曰:‘少阴无输,心不病乎?对曰:其外经病而藏不病,故独取其经于掌后锐骨之端’,正谓此也。”^{[4]130}

今检王氏引《持针纵舍论》文见于传世本《邪客》篇。说明传世本《邪客》或系原始本多篇合编而成,或由于早期传本《持针纵舍论》《邪客》紧相邻,而前者的篇题文字脱失,其正文被混入传世本《邪客》篇。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王冰注曰:“去,居室。《灵枢经》曰:‘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4]11}

今检王氏引《灵枢经》文见于传世本《素问·脉要精微论》篇。

《素问·至真要大论》:“以淡泄之。”王冰注曰:“淡利窍,故以淡惨泄也。《藏气法时论》曰:‘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灵枢经》曰:‘淡利窍也’。”^{[4]511}

今检以上王冰引《灵枢经》文不见于传世本。

《素问·离合真邪论》:“其气以至,适而自护。”王冰注曰:“《针经》曰:‘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此其义也。”^{[4]171}

《素问·针解》:“为虚与实者,工勿失其法。”王冰注曰:“《针经》曰:‘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此之谓也。”^{[4]282}

此篇下文即有“经气已至,慎守勿失”句,王冰

不引本篇经文而引“《针经》曰”，与《素问·离合真邪论》同；又知《针解》篇注解《针经·九针十二原》，故知所引“经气已至，慎守勿失者，勿变更也”系《针经》之文也，王冰所见之《针经》传本此未脱，故能引之。

关于外篇《素问》编次的改动，特别是唐代王冰重注时的大幅度的调整已多为今人所知，不再详述。而关于《针经》编次的变动虽然远比《素问》小，但也有证据表明传世本的编次已与原始本有所不同，最明显的例子是，结语篇《官能》在传世本中序为第 73 篇，而不是最后一篇。

当最初《素问》之外的各篇被总称为“九卷”时，就暗示其时《素问》已非 9 卷。又早期传本《针灸甲乙经》《太素》所录《素问》文本也皆未发现整篇不见于传世本者，这提示二种可能：其一，《素问》篇目亡佚的时间很早；其二，《素问》原本只 8 卷，除非在一传出时就有亡佚。

据笔者考察，最早的直接引用《针经》《素问》者为汉代《难经》《黄帝明堂经》，最早直接引用且标明出处者为魏晋《脉经》。

关于传世本《灵枢》《素问》的源流，日本学者真柳诚教授据其近年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现行《灵枢》24 卷，系依据北宋元祐刊《针经》9 卷系统改编而成，祖本为南宋国子监绍兴二十五年序刊本。此时国子监将《灵枢》与《素问》合刻，两书合刻本总称《黄帝内经》^[18]。

6 讨论

面对汉以前各家诸说纷呈的医学思想，如何裁剪？如何拼接才能构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从《针经》绪论篇《九针十二原》可看出，作者的目标很明确——创作一部“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的针经，以旧经为砖瓦盖新楼，而不是整理古医籍，显然与刘向、李柱国汇校汉以前诸医家单篇文献以为各家总集定本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

在《针经》设计上，开篇始于黄帝问道，结语篇终于黄帝布道，前后呼应，环环相扣，充分展现了作者全书设计上匠心独具的大局观和叙事技巧。

《针经》一书在总体设计上逻辑之周密，可从传世本第 10 篇《经脉》的编纂而窥见一斑：作者通过《营气》《五十营》《经水》《脉度》《禁服》《经别》《营卫生会》《逆顺肥瘦》诸篇一层层的铺垫，最后完成《经脉》篇十二经脉流注“如环无端”的环形模式的逻辑构建。类似这种层层铺垫、环环相扣的篇章设

计案例在《针经》比比皆是，这种前后关联的设计只能是出自一人之手。足见《针经》有统一的总体设计、统一完整的思路框架、统一的表达风格和习惯，通过演绎的方法一层层一步步推演而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部理论创新之作，完全不是学界所认为的非一时之文一人之作的“论文集”性质。

内外篇的设计总的看来，内篇的设计在于体现理论创新，外篇设计主要体现文献整理；《针经》精编，《素问》粗编，二者的不同性质，不同定位决定了在设计和加工环节的不同的处理方案。

在编撰方式上，内篇在采用旧文献时大量采用合编方式改编，在不同旧文本之间添加连接段落，并常常在文本的篇首篇尾“戴帽”“穿鞋”留下作者创作的特征性标识，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新文本。相比之下，在王冰改编之前的外篇《素问》这种情形很少。可见，内篇与外篇不仅性质不同，编撰方式也大不同，内篇编撰方式为“撰”，而外篇为“编”。由此推断，如果《汉书·艺文志》著录的 7 家医籍能重见天日，或考古发现更早的单篇流传的医书，很有可能会见到与《素问》相同或高度相近的文本，却很难在《针经》找到相同或高度相近的文本。

在素材的选择上，已知《针经》《素问》的主人公是“黄帝”，那么汉代刘向父子校定的《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无疑是取材的首选；又据笔者考察可知，扁鹊医籍的大量文字也见于《针经》《素问》^[19]，可见刘向父子校定的《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也是素材之一，只是引用时将原文献中的主人公由“扁鹊”改换成“黄帝”。在材料的取舍上，如果与作者新定的理论框架相容的扁鹊医学内容多直接采用，稍有出入的采用改编的方式引用，而相抵触的文字则弃而不用。虽然在传世医籍中没有发现标识明确的有关白氏医籍的文字可供比对，但可以推断：刘向当年整理的《白氏内经》《白氏外经》《旁篇》也是编撰《针经》《素问》的素材之一，其取舍原则也如引用扁鹊医籍一样——适则用之，不适则舍之。内篇外篇的定位不同，取材也当不同——内篇《针经》当以《黄帝内经》《扁鹊内经》《白氏内经》3 家内经为基本素材，而外篇《素问》则以 3 家外经及白氏旁篇为基本素材。

内篇《针经》是用古人或前人的文献为砖瓦盖新楼，旧材料不合用则改造之，不足时则新造之；外篇则更多保持原文献的旧貌，甚至内篇改编用过的素材，原文献大多还保存于外篇，哪怕是残文断简只要是与内篇相关者也保存于外篇，而不轻易丢弃。

《针经》《素问》虽为同一部书，但在编写次序

上,是先编内篇后编外篇,对此《九针十二原》说得很清楚:“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篇]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

考察传世本《灵枢》《素问》的编写时间坐标也能发现非常有力的证据:除了《素问》有众多篇章是解释和阐述《针经》经文的证据之外,还有更多更有力的证据:其一,《素问》有《八正神明》《离合真邪》2 篇专门注解了《针经》结语篇《官能》的大段经文——仅此 1 条便足以判定外篇《素问》成于内篇《针经》之后;其二,从篇目设计看,内篇有《玉版》,外篇则有阐述此篇的《玉版论要》《玉机真藏》;内篇有《经脉》,外篇有《经脉别论》。

最后说明一点,有确定证据表明,今天所见的马王堆、张家山、老官山出土的汉代及汉以前古医籍,《针经》作者或者刘向、李柱国校书时见过,例如经脉文献,马王堆《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以及老官山最新出土的经脉文献的特征性文字在《经脉》《经别》《营气》《经筋》也有痕迹,之所以出土文献的文字没有完整出现在《针经》中,正是因为该书是一部理论创新之作,而非文献整理之书。而在更晚的偏于文献整合的《黄帝明堂经》则可见更多出土文献的相关文字^[20]。

参 考 文 献

- [1] 灵枢经[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
- [2] 淮南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6:1240.

- [3] 于光.《伤寒论·序》作者之我见[J]. 贵阳金筑大学学报,2005(3):99-100.
- [4] 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 [5] 黄龙祥. 针灸甲乙经:精编版[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30-131.
- [6] 班固. 前汉书艺文志[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7] 李秀华.《淮南子》书名演变考论[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5):25-29,60.
- [8] 黄龙祥. 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130-131.
- [9] 刘海燕. 西汉梁孝王东苑初探[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3):139-141.
- [10] 郑一.《灵枢·大惑论》开创了精神分析的先河[J]. 中医药学报,1995(4):3-4.
- [11] 黄龙祥. 经络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52-65.
- [12] 黄龙祥. 扁鹊医籍辨佚与拼接[J]. 中华医史杂志,2015,45(1):33-43.
- [13] 黄龙祥. 扁鹊医学特征[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5,21(2):203-208.
- [14] 杨上善. 黄帝内经太素[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6:340.
- [15] 李德辉. 兰台及其与东汉前期文学[J]. 华夏文化论坛,2015(01):29-38.
- [16] 李更旺. 西汉府官藏书机构考[J]. 图书馆杂志,1984(1):67-68.
- [17] 黄龙祥. 针灸名著集成[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5.
- [18] 真柳诚. 黄帝医籍研究[M]. 东京:汲古书院,2014:74-75.
- [19] 黄龙祥. 扁鹊医籍辨佚与拼接[J]. 中华医史杂志,2015,45(1):33-43.
- [20] 黄龙祥. 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692-694.

(收稿日期:2019-12-20)

(本文编辑:牛亚华 田博)

· 简讯 ·

中医药期刊刊载新冠肺炎文献简况(2020 年 3 月 2—13 日)

本刊编辑部

为全力配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文简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积极宣传有关新冠肺炎的研究成果,推动学术交流,中华中医药学会从 2020 年 3 月起,每周对中医药期刊发表的新冠肺炎论文进行梳理、推送。本刊编辑部据推送报告统计,截至 3 月 13 日,共有 31 种中医药期刊发表有关新冠肺炎论文 166 篇,分别为:《中医杂志》(9)、《中华中医药学刊》(7)、《中国实验方剂学》(4)、《中华中医药杂志》(3)、《中国中药杂志》(7)、《中医学报》(16)、《中国中医急症》(6)、《中医药信息杂志》(3)、《中医药通报》(1)、《吉林中医药》(2)、《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3)、《中国民间疗法》(9)、《中医临床研究》(5)、《天津中医药》(9)、《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1)、《中国现代中药》(1)、《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4)、《西部中医药》(8)、《中医儿科杂志》(1)、《中国现代中医药》(1)、《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1)、《江苏中医药》(2)、《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河北中医药学报》(3)、《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6)、《中医教育》(12)、《现代中医药》(2)、《上海中医药杂志》(20)、《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福建中医药》(13)、《康复学报》(3)。

这些文章涉及面广泛,主要分为 6 个大类:辩证防治(51)、病因病机(13)、专家共识及建议(19)、临床研究和病例分析(34)、药学研究(7)、数据挖掘(9)、疫病期间的生活起居、心理疏导、教学管理等其他方面的内容(33)。